

长天集 下编

● 金 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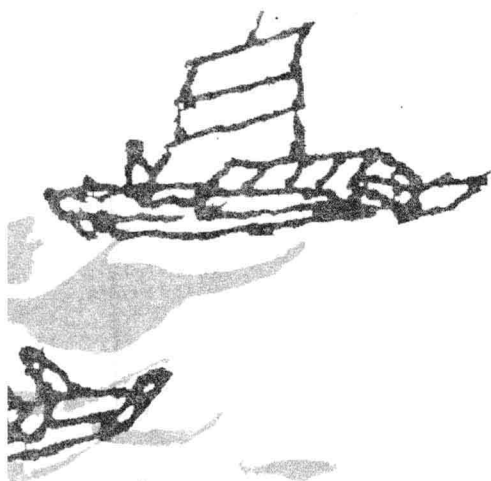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长天集

下编

金梅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目 录

下 编

文化世家的风采	(677)
章士钊与鲁迅之间的历史公案	
——现代文化史札记	(688)
巨人与蜗牛	
——现代文化史札记	(695)
阅读陈寅恪	(703)
毛彦文缘何不嫁吴宓	(709)
实事求是地评价顾准	(715)
乌木山僧其人其事	(723)
一代才女吕碧城	(727)
绵延昆曲的功臣穆藕初	(731)
一位值得怀念的编辑出版家	(737)
孙中山褒奖的黄二南	(740)
从曾园到张园	(744)
寻访藏书楼	(748)
剖石呈清琪	(756)

长天集(下)

声声入耳 事事关心

——无锡“东林书院”参观记 (761)

《力原》小论 (765)

农村新人赞

——欣赏《社迷》小札 (769)

《龟岛》阅读记 (773)

《六月》阅读记 (777)

新颖文体的创造:神话现实主义小说

——姜天民、吴若增、邓九刚三家作品阅读记 (781)

翻译家傅雷创作的小说 (789)

唐人传奇人物描写三题 (795)

短篇小说的文体和艺术发展史略 (807)

变换了主题的寿宴

——叶文玲中篇小说《浪漫的黄昏》读后印象 (823)

鲍昌中篇小说《昂星团之歌》读后印象 (829)

论《东方女性》的得失 (837)

并不轻松的阅读 (847)

《山水情》——浩然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 (856)

浩然十年创作描述 (868)

柳溪近年的小说创作 (894)

友人赠书谈

周天:《文人的悲哀》 (915)

赵玫:“唐宫女性三部曲” (917)

周实、曾月郁:《李白》三部曲 (919)

叶至善:《古诗词新唱》与《我是编辑》 (924)

姜德明:《余时书话》与《书叶集》 (929)

朱文华:《传记通论》、《鲁迅、胡适、	
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	(931)
蒋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	(934)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939)
叶文玲:《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942)
黄科安:《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	(946)
《韩天衡谈艺录》	(949)
及容:《饥饿荒原》	(953)
李玲修:《体育之子荣高棠》与《姑娘跑向罗马》	(956)
谈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	(961)
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974)
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	(986)
杨振声的中篇小说《玉君》赏析	(1018)
路翎的长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赏析	(1024)
郑振铎的历史小说《桂公塘》赏析	(1030)
一个少年英雄的诞生	
——评周骥良的长篇小说《我们在地下作战》(上部) ...	(1038)
读冉淮舟的长篇小说《建设者》	(1044)
地域文化小说:《裤裆巷风流记》	(1053)
杨润身的两部长篇小说	
《天堂里的凡人》	(1060)
《危险火花》	(1063)
王学仲作《吼哈》阅读记	(1066)
为了这片土地	
——读韩乃寅的长篇小说《龙抬头》	(1070)
读石楠著《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随想	(1077)

长天集(下)

关于《青春之歌》二题

林道静的生活道路 (1085)

读“林道静在农村” (1090)

抗日战争的生动画卷

——话剧《东进序曲》观后感 (1094)

越剧观赏记

《党员登记表》 (1097)

《金鹰》 (1098)

纯粹的文学家

——孙晓玲著《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代序 (1101)

一个“文学人格学”的雏形 (1109)

《孙犁全集》编校琐议 (1150)

梁斌先生的文心 (1161)

重读《红旗谱》 (1171)

中国梦文化的开拓 (1179)

《中国人气质》与阿 Q 性格的参照 (1186)

读一读龚自珍《京师乐籍说》 (1191)

乾隆严督《四库全书》的校勘 (1194)

京师大学堂设在上海的译书局 (1199)

杂谈《瓶外卮言》及其它 (1201)

南开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1208)

一部鲜为人知的名著及其译者 (1211)

一部稀见的译诗集 (1213)

从艺术先驱李叔同到弘一法师 (1215)

李叔同的改革创新精神及其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	(1237)
李叔同人格力量之表现	(1254)
温州对弘一大师的意义	(1264)
李叔同十日谈	
一代文宗李叔同	(1272)
维新思潮中的李叔同	(1273)
李叔同艺事的启蒙者	(1275)
严修关注李叔同	(1276)
李叔同“辛丑北伐”	(1277)
李叔同的两位老师	(1278)
李叔同江南话别孟广慧	(1280)
最早知悉李叔同出家的乡贤	(1281)
亲属思念李叔同	(1283)
李叔同的两个侄子	(1284)
琐谈李叔同	
“李三爷办了一件奇事”	(1286)
不合常情的时间观	(1288)
李叔同的幽默	(1289)
李叔同“承祧”引起的疑惑	(1291)
李叔同何时结识内山完造	(1293)
“李怀霜”并非李叔同之别名	(1296)
整理、校注《李蘋香》后记	(1302)
李叔同研究之我见	(1306)
想象与虚构中的李叔同	(1309)
莫将虚构作传记	
——我看电视连续剧《弘一大师》	(1315)
读缪志明文章后两点想法	(1332)

长天集(下)

关于“雨夜楼‘藏’李叔同画作”的真假问题

——录以代辩并《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代跋 …… (1335)

弘一研究的重要收获

——读徐正纶编著《弘一大师诗词全解》…………… (1355)

道听途说怎能成信史？

——对证因《李叔同皈依佛记》的辨证…………… (1359)

李士珍与李世珍之辨…………… (1364)

文化世家的风采

前两年,在浦东一家书店看到一本很孤僻、很奇特的书: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以下简称《望族》),出于好奇和因其与我的出生地有些关系,便买了下来。五十多万字的一本书,很厚很重,我从南方将它带到北方,一直搁在那里没有读过。近日整理书籍时又见该书,还是受好奇心的驱使,便细细翻阅了一过。印象是:虽说《望族》一书,行文枯燥了一些,又大半是家乘、族谱和方志等史料的罗列,给人以烦琐堆砌之感,但确实值得一读。尤其对文化(包括文学)史研究者,不无启迪之处。

所谓“著姓望族”(俗称“名门望族”),是指在区域性的姓氏家族中,最具声势和代表性的家族。按照《望族》作者所说,“他们或有财有势,或深孚众望,声名煊赫。雄据一方,在当地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里都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以下录自《望族》一书的引文和史料,不再出注),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琅玕王氏和陈郡谢氏(即刘禹锡《乌衣巷》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所说的“王谢”)两家,便是这类著姓望族的典型。按其门祚,即其来历衍衍以及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著姓望族可以分为官宦世家、豪门右族(俗称暴发户)、文化世家和人丁兴盛的大族等几种类型。《望族》一书作者,在翻阅大量方志谱牒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上海地区三百多著姓望族的生成演变,作

了系统的勾勒,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二十家,更作了详细的描述。其扎实、审慎、科学的研究态度,令人钦敬。区域文化的研究,现在似乎成了一个热门时髦的话题,但不少此类研究著作,往往给人以粗疏架空、大而无当之感。殊不知,任何区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都有其一定的渊源和载体,并非空穴来风,也决不会是缥缈玄虚之物。一地著姓望族的生长演变,即为该区域文化承衍的重要载体,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所呈现的生态、心态,及其所起作用 and 影响的综合,则是构成该区域文化内涵和特点的渊源之一。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望族》一书,实在是开辟了一个区域文化研究的新途径,沿此途径,则有可能将这类研究建立在更加扎实可信,并步步引向深入的基础之上。

形成某一区域文化内涵和特点的,当然不只是文化世家的作用和影响,但这类著姓望族的消长盛衰,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人丁兴盛,固是著姓望族门祚绵延的首要条件,但在兴盛的人丁中,还需要有杰出人物的不断涌现,否则,著姓望族也就慢慢地变成普通之家和平民百姓了。比较起来,在各类著姓望族中,文化世家的门祚更为久远一些。下述几个明清时期上海地区文化世家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了。

秦氏宗族——

其始祖秦观[1049—1100,字少游,号太虚,别号“淮海居士”,“苏门(苏轼)四学士”之一],系北宋著名词人。其六世长孙知柔,原居江苏扬州,南宋成淳年间(1265—1274)为避兵乱挟其先世纶诰谱谍渡过长江,迁居上海县西淡井庙(今上海市卢湾区永嘉路东首瑞金医院附近),其二弟知微、三弟知立,则分别迁居上海浦东南汇九团和青浦赵屯。此秦观六世孙三昆仲,即为秦氏宗族渡江迁沪之祖。秦观七世孙:知柔次子良颢,精通蒙语和维吾尔语,有《纂通》、《一贯》、《吹万集》等译著,一时南北为蒙古语者无出其右。秦观八世孙、良颢长子裕伯,元至正甲申进士,入明后,因朱元璋檄诏,不得已出任治书侍御史,与时任御史中丞的著名文学家刘基同

为京畿主考官。秦裕伯死后,朱元璋敕封其为“上海城隍爷”,并追赠他“显佑伯”。往后上海地区秦氏宗族的裔孙中,仍不乏甚有名望的文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日“上海城隍爷”的后代中,有一位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人,他便是中美建交后,中国接受的第一个华裔美国记者、《华尔街日报》首任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秦家聪先生。从代序上说,他已是北宋大词人秦观第三十四代裔孙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秦家聪先生发现自己是秦观后代之后,决心寻根访祖、缕述族史,终于在1988年出版了五十多万字的英文著作《一个中国家族九百年来的生活》(或译作《秦氏千载史》),书中还附了很多照片。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年代跨越最长的一部中国家族史。从那中间,或能见出一个文化世族,何以能绵延久远的奥秘。

钱氏宗族——

该族原籍江苏常熟,明正德年间(1506—1521),方由钱镒始迁上海嘉定之盛泾。钱镒八代孙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进士,历任编修、侍读、侍讲学士、少詹事、广东学政等官。钱大昕在官职上还可能晋升高位,但他淡于荣利,五十岁后即归籍返里,以讲学著述为务,终成清代著名学者和诗人,撰有《二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诗文集》等。作为诗词大家,钱大昕的作品,由一代词苑巨擘沈德潜(著名的《古诗源》和唐、明、清三朝诗别裁集的编纂者)编入《江左七子诗选》,不只风行海内,还流传东瀛,得到高度评价。这在当时封闭的中国,实属艺林盛事,钱大昕之诗词,亦由此而为海内外所看重。大昕之弟大昭,精通经史,传入《清史稿》儒林之列,时人于钱氏昆仲更有“两苏之比”。作为文化世家,钱氏宗族自大昕一代奠基后,声望日隆,瓜瓞绵绵,门祚久远。大昕长子东璧,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太学生,诗文名重公卿,有“小钱”之称;次子东塾,廪贡生,善隶草,工山水,并著有《月波楼》等诗集。大昭的三个儿子东垣、绎、侗,《清史稿》中说他们“皆潜研经史、金石”,时称“三凤”。钱

长天集(下)

大昕、钱大昭之孙、曾孙、玄孙以及再往后的裔孙中,亦多继承家学、精通语言文字和擅长书艺者,如解放后曾供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钱仍烈,即为钱大昕的八代孙(从始迁祖算起,已是钱氏宗族的第十六代孙)。如今,钱大昕一族的后裔,大都散居于京、沪和江苏各地,也有不少人侨居国外。他们之中仍不乏名人和革命干部,如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和原天津市副市长钱其敖昆仲等。

沈易家族——

这是一个以书法艺术著称的文化世家,历十世以上,联贯明清两朝。早在明永乐年间,沈易之子沈度、沈粲,就以善书入选翰林院供职,明成祖朱棣赞誉沈度为“我朝王羲之”,对沈粲之书法亦大加揄扬。沈氏昆仲的后裔,则以书法艺术世代相传。及至清初,沈粲十世孙沈荃,以能书而享特达之遇,康熙御座箴铭及殿庭屏幢上的字,即出自其手笔。沈荃第四子沈宗敬,受家学影响而兼工书画,为康熙所器重。直至清嘉道年间,沈易这个文化世家中,尚有沈荃五世孙沈第(沈粲十六世孙、沈易十七世孙)等衣冠人物和工诗善书者。

陆深家族——

自曾祖陆德衡迁居浦东,即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文化世家。至第四代孙陆深,文化成就愈发突出。陆深不仅官至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且为明代中期的文学大家,著有《俨山集》和《俨山外集》。其后裔,在文史书艺领域多有成就。子陆楫,所著《蒹葭堂稿》和《古今说海》等诗文集极为有名。曾孙陆垕、陆垿兄弟,工诗善书,董其昌赞之为“有二陆词翰”。从曾孙陆起城,务实学,有《西林辟释》等多种著作。玄孙陆珑,于经史子集无所不窥,有《文裕遗稿》十卷、《百一诗集》等存世。六世孙陆天锡,工书法,其作品远近珍之。从七世孙陆锡熊,与著名文学家纪昀,同为《四库全书》总纂官,并纂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后又被派总校《永乐大典》,其学识文采之深厚超卓可见一斑。从九世孙陆

增兰,品学醇邃,既长古诗古文,亦工书法绘画……

在明清时期开始形成的上海地区著姓望族中,还有不少门祚超越五世、延续了二三百年以上的文化世族。如:嘉定王鸣盛家族(该族上溯起自明万历年间,七代孙王鸣盛为清代“吴派”考据学大师,其所著《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并称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他也是以诗闻名的“江左七子”之一);南汇傅氏宗族(该族上溯起自明代后期,三百多年后的裔孙中,有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及其长子、著名钢琴演奏家傅聪等);上海郁氏宗族(该族上溯起自清康熙年间,二百多年后的裔孙中,有当今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于光远——原名郁钟正先生,他是该族“小郁家”一支的鼻祖郁莲塘的玄孙;1995年举办“上海老城厢史迹展览”时,于老先生还为其题词“旧城新传”呢),等等。

孟子虽然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实际情形,并非都是如此。就明清时期上海地区而言,除王室、贵族的后裔可以世袭,以及少数因皇上降旨特许而能荫庇者外,不少著姓望族的门祚,确如孟子所说。尤其是官宦世家和豪门右族,往往由于改朝换代和某些突发性事变的原因,或因其后裔的养尊处优不求进取,甚至花天酒地生活糜烂而很快坐吃山空一败涂地。相比之下,文化世族的门祚则能长久一些。探讨这一世族的生长和绵延的规律,对当下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以期待有更多科学、文化大家的出现,确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从《望族》一书作者的研究来看,以下三点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

一是,文化英才的出现,决非一朝一夕的偶然之事,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匆促铸就,它是若干代人文化积累与绵延的结果。

除了秦氏宗族的远祖秦观,系宋代著名词人,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文化世族,与官宦世家和豪门右族等类型的著姓望族一样,在其始迁祖时期,均系默默无闻的寒门细族。以清代考据学大师和著名诗人钱大昕为标志的嘉定钱氏宗族,从始迁祖钱镒到钱大昕

长天集(下)

曾祖钱岐,五代祖先都是力耕务农的普通农民,家族中并无读书应考者。直到钱大昕的父祖辈,才勉强跻入得以耕读兼顾的行列,但也只是依靠课徒维持家计的穷秀才罢了。钱大昕并不回避其出身的微寒,他多次说过“予家贫无负郭田”、“累世寒士”这样的话。从明代中期著名文学家陆深开始形成的浦东陆氏文化世族,其祖先亦并非出自“文献之家”和“书香门第”。陆深曾祖陆德衡,因其父在明洪武初年不幸蒙冤而投水自尽,他便离开浙江嘉善的老家,流浪至浦东,并入赘于当地章姓人家。开始,因其系“倒插门女婿”而常受左邻右舍的欺侮。只是由于陆德衡这人涵养极好,加上其妻章氏的妇道美德,才慢慢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并在夫耕妇织、勤俭持家中渐至小康。这就有了使后代接触文化的基础。在陆深成为一代“词臣”和著名文学家之前,其家族中虽无获得功名之人,仍都是一介布衣,但陆深的祖父陆璿,喜读书爱书画,每见后生,必教以求上进。陆深之父陆平,从乡里前辈精研经学,颇有心得,并继承乃父爱好,真草行书,“逼近晋唐风致”。他对儿子陆深能勤奋治学,更多奖勉。

嘉定钱氏宗族和浦东陆氏宗族,由耕作之家发展成为文化世家,并涌现钱大昕和陆深这样突出的文史大家,分别经历了八代和四代之久的孕育期。它如上海董氏宗族,从始迁祖到出现明代大画家董其昌,中经八代;奉贤何氏宗族,自宋朝时由北方南迁,到明朝嘉靖年间出现著名文学家、美术家和藏书家何良俊(有《清森阁集》、《四友斋丛说》、《何氏语林》、《世说新语补》和《书画铭心录》等多种著作),中经八代;青浦陈氏宗族,自宋朝南渡,至出现明末抗清领袖、著名诗人陈子龙(沈德潜赞其诗“垦辟榛芜,上窥正始,可云枇杷晚翠”),中经五代;与钱大昕齐名的清代史学大家、嘉定王鸣盛,其祖先虽为望族,但该族涌现他这样杰出的学者,从始迁祖算起,也是在四代之后了……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代中国,欲从一介布衣上升到较有社会地位的层面,绕不开科举入仕的途径。现在来看,这

一历史定规,既有消极的(主要的)一面,亦有正面的影响。诚然,便是那些文化世家,其子弟们十年寒窗的初衷,同样是为了中举当官;但如此代代延续的结果,整个家族的文化素质,不断地得到了提高,若干世代之后,就会有标志其家族文化成熟期已经到来的英才涌现。这一文化现象启示我们:轻忽子弟们的文化修养是没有希望的,然盼望急就也是难以奏效的。唯有代代相传地重视文化(还有思想道德)素质的修养,才可望有堪称大师级人才的出现;对一个家族来说是这样,整个国家和民族又未尝不是如此呢?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的唯成分论是错误的,但就文化领域而言,能否成“龙”成“凤”的关键之一是其自身有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即是横空出世的天纵之才吧,也得以一定的文化为基础;不能想象,从出于不识之无之家者,一夜之间会突然成了大师巨擘。从明清时期涌现过顶尖人物的上海地区文化世家的情形来看,其始祖大多系没有文化的耕作之人,即有些文化,层次也并不很高,但当他们获得了一定的生存条件之后,都非常重视子弟们的文化教育(尽管是为了他们日后能够科举入仕,以改换门庭);其子弟们在获得一定的功名之后,为了门祚不绝,簪缨联翩,对其后嗣,亦能承继其先祖的传统,进一步在文化教育上加大力度。就是这种世代相继的量变过程,一旦时机成熟,终于产生了质的飞跃——孕育出了那些在某一方面成果辉煌的文化名人。而以这些文化名人为标志的某一家族的后裔们,再将其历代祖先的传统继承下去,并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成果,如此,才能长时期地保持着作为文化世家的声望。

二是,要善于有目的地选择适宜于文化英才生长的环境。吴仁安先生在著作中谈到著姓望族的形成因素时,有“向心移植”一说。按他的解释,所谓“向心移植”,是指主动地积极地选择新的生活环境,能如此者,“一般都具有生命的活力”。吴先生并认为,那些“安土重迁者”,“大都故步自封而难有出息”;而“流浪性太大的人”,“由于流动太广亦往往不能成就什么事业”。吴先生没有

长天集(下)

进一步阐述是何种因素,促使那些著姓望族的始迁祖们能主动地和积极地去选择新的生活环境(所举例子,仅能说明他们是为了避免动乱或为了改变一般的生存环境而迁徙);也没有具体阐明,是怎样一种新的生活环境,使其家族从此获得了发展成为著姓望族尤其是文化世家的条件,但他的“向心移植”一说,的确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所谓生活环境,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一般来说,这三个方面较为开放、发达的地方,也是适宜于人才发展的处所。《望族》一书没有举出这方面典型的例子,但我们可以南汇傅氏宗族(也在明清时期上海地区三百多家著姓望族之列)的后裔、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为例略作说明。

据清末储学洙撰《芹香小识》卷二所载:南汇傅氏宗族,自“明,龙庵公始迁居六灶。……将二十世于兹矣。分五房,散居各处数百家,盛族也,文风亦盛。”出生于六灶以西渔潭乡傅家宅的傅雷,即为这一文化世家的后裔。

在傅雷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进展中,有三次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变换,带有关键性的意义。而每次变换,都是他母亲为其选择和决断的结果。第一次是在1912年,傅雷还不到四周岁的时候。那一年,原在周浦镇扬洁女中任教的傅雷之父,被人诬告入狱,在牢中受了三个多月的折磨。等到用巨款把他保释出来,已到了痼病的后期,不久就去世了。这前后,傅雷的母亲,忙于营救丈夫和给丈夫治病,以及接着而来的办理丧事,无暇照料儿女,两个弱小的儿子和一个女儿,相继夭折了。一年之中,傅雷家连失了四口人。面对这种家败人亡的严重情势,傅雷母亲非但没有被压倒冲垮,她还勾画出了与傅家日后命运有关的图景:除了守住仅存的家业,还要把他唯一的儿子傅雷培养成人。在这样的人生抉择中,她带着傅雷离开老宅,搬迁到浦东周浦镇。

傅雷虽出生于“文风亦盛”的文化世家,但随着区域状况的变化,时代所需文化内含的不同,其宗族世代聚居之地,逐渐不如他